

中国农村金融排斥的区域差异： 供给不足还是需求不足？

——银行、保险和互联网金融的比较分析

□ 栗 芳 方 蕾

摘要：根据2015年上海财经大学“千村调查”的调查数据，本文深入分析了农村金融市场银行排斥、保险排斥和互联网金融排斥的程度及根源。基于渗透度、使用度和效用度三维度指标体系，用信息熵法测度了农村金融市场的银行排斥、保险排斥和互联网金融排斥的程度；运用Oaxaca-Blinder分解法从供给排斥、自我排斥和无需求三角度寻找导致金融排斥的根源。研究结果发现，中部农村地区存在最严重的银行排斥和保险排斥，西部农村地区的互联网金融排斥最为严重。农村银行排斥的主要根源是供给排斥，尤以价格排斥和营销排斥最为突出；农村保险市场中，供给需求理论完全不发挥作用；农村互联网金融排斥则主要源于供给排斥中的物理排斥。一些外部因素如外出务工、经济状况、信用环境和交通便利等也影响着农村金融排斥。各地区需针对金融行业排斥的深层次根源有的放矢，则能有效降低农村金融排斥。

关键词：金融排斥 地区差异 Oaxaca-Blinder分解 供给与需求

一、引言

在现代社会中，建立一个惠及全民的金融体系具有毋庸置疑的重要性。但资本嫌贫爱富的本性促使金融服务具有明显的排斥性，大量优质的金融资源集中于城镇、大型企业和富裕人群，而将农村地区、中小企业和低收入阶层排斥在外（Morrison & O'Brien, 2001；Leyshon & Thrift, 1993, 1994, 1995, 2008）。2003年12月，联合国提出了普惠金融的概念，认为“世界上大多数穷人仍然难以获得储蓄、信贷、保险等金融服务。我们的一大任务就是消除那些将人们排除在金融活动之外的因素……我们能够也必须实施普惠金融来改善这些人的生活”。2005年，联合国在“国际小额信贷年”宣传中将普惠金融定义为能有效、全方位地为社会所有阶层和群体提供服务的金融体系。2006年，我国正式引入了普惠金融的概念，并得到了高度重视与推广。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正式提出了“发展普惠金融”，并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认为普惠金融是指能有效、全方位地为社会所有阶层和群体提供服务的金融体系。

金融排斥与普惠金融是同一问题的不同视角。或者说，正是因存在金融排斥，才需要普惠金融。学者们对金融排斥的研究远早于普惠金融。Leyshon和Thrift（1993, 1994, 1995）认为，金融排斥特指银行关闭分支机构影响民众对银行服务的可获得性，揭示了普惠金融的缘由。现实中的金融排斥则是以美国历史上“划红线”拒贷事件^①为代表。20世纪90年代开始，越来越多的研究关注于某些特定社会阶层无法获得现代金融服务的被排斥现象。Leyshon和Thrift（1995）将金融排斥定义为某些阻挡特定社会阶层或人群获得正规渠道金融服务的行为和过程。Conroy（2005）认为，金融排斥是指贫困人群和弱势群体难以获得正规渠

道金融服务的现象。近年来,金融排斥的研究视角不再仅局限于传统的银行业务。2009年,印度政府计划委员会认为,金融排斥的范畴不仅包括信贷,还应包括其他一系列金融服务,如保险和汇款等。焦瑾璞(2014)也指出,国际上最初重点关注的是银行信贷的排斥性,有时也考虑保险业,较少涉及证券业等其他金融业;但国际组织近年提出了“宽内涵、多维度”的普惠金融,广泛涵盖包括支付、存贷款、保险、养老金、证券、互联网金融等众多金融领域,努力实现更高层次、更宽纬度和更深内涵的金融普惠。

众多学者已经证实,金融排斥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Beck & Honohan, 2008),2012年,世界银行估计全球大约还有27亿成年人得不到任何正规金融服务。中国的金融排斥也非常明显,特别是贫困地区农户的基础金融服务严重不足(许圣道、田霖, 2008)。那么,中国农村地区的金融排斥现状究竟如何?他们被排斥的深层次根源是什么?各地区间又有什么显著的差异呢?另外,近年来,互联网金融在我国发展非常迅速,这一新兴金融与银行、保险等传统金融的排斥又有何不同的表现呢?上海财经大学2015“千村调查”对中国农村金融排斥的现状成因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本文期许在前人的研究成果之上,(1)根据拓展的金融排斥概念,不仅涵盖农村金融市场的银行排斥,还包括保险排斥和互联网金融排斥^②,并根据各行业的不同特征,构造合理的指标体系衡量各行业排斥度,比较各农村地区不同行业排斥的表现差异;(2)探索导致农村市场金融排斥的深层次根源,究竟源于供给排斥、自我排斥还是无需求,并分析银行、保险和互联网金融产生排斥的深层次根源,以提出降低农村金融排斥的对策建议。

本文结构如下:第一部分为引言,第二部分为调研过程与调研结果分析,第三部分为文献综述与研究设计,第四部分为实证排斥,最后为对策与建议。

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1)在理论上厘清了金融排斥的表象与根源的不同含义,系统地设计了衡量金融排斥程度的指标体系:表象是金融排斥的现实表现,是人们对金融服务的使用情况及使用之后的感受;而根源是导致金融排斥的深层次原因,是人们为什么这样用及为什么有此感受的根本原

因。(2)基于拓展的金融排斥概念,比较分析了各农村地区银行、保险和互联网金融排斥的不同表象。银行排斥和保险排斥均以中部最甚,互联网金融排斥则以西部最甚^③。(3)运用Oaxaca-Blinder分解法系统分析农村各金融行业排斥的深层次根源,除考虑传统的供给和需求因素的影响情况之外,考虑了无真实需求的特定情况。农村市场的银行排斥主要源于供给排斥,尤以价格排斥和营销排斥最为突出;保险市场上,传统的供给与需求理论不发挥作用,保险市场基本失灵;而互联网金融排斥则主要源于供给排斥中的物理排斥。当然,本文的研究也存在着明显的不足。本文所基于的千村调查仅调查了2015年的金融排斥情况,仅对一个时间点进行了截面分析,未考虑动态变化。

二、农村金融排斥的特征

(一)调研过程

上海财经大学暑期“千村调查”自2008年以来已进行了8年。2015年“千村调查”的主题为“农村基础金融服务的覆盖与使用”。围绕这一主题,我们设计了针对县金融办、乡镇代表金融机构、村委会及农户家庭4个层次的问卷,以多角度地全面了解农村金融现状。30位带队老师带领着309名学生组成调查团队,深入20个省份定点调研了30个县。调查对象则依据多阶段系统规模成比例的不等概率抽样法而确定。首先根据与人口规模成比例的人样概率抽取了30个县,从每个县中抽取了具有代表性的2个乡镇,再从入选的每个乡镇中分别抽取2个行政村,最后从入选的每个行政村中随机抽取50户农户。然后,在剔除了一些回答不完整的调查问卷之后,最终得到了30份县金融办问卷,60份乡镇代表金融机构问卷,119份村委会问卷和5638份农户家庭问卷。其中,金融办问卷是基于全县的调研,包括该县的基本情况、金融发展现状、金融覆盖情况、金融状况评价等部分。金融机构问卷则是针对该金融机构存贷款业务的规模、产品、业务、纠纷处理等方面的调研。村委会问卷是基于该村的调研,详细调查了有关村的人口情况、金融、保险、劳动力转移状况、经济情况、土地情况、教育、医疗卫生、基本公共服务、生态环境、交运通讯、住房、政治法律和文化等多个方面。农户家庭问卷则是

基于该农户家庭的调研,包括家庭基本情况、传统金融服务情况、保险使用情况、互联网金融、农村信用体系和村庄治理的看法等。

本次农村调研的取样地区总共 20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图 1)。东部包括吉林、辽宁、山东、河北、浙江、江苏、安徽和广东,中部包括山西、河南、江西、湖南和湖北,西部包括甘肃、陕西、广西、四川、重庆、云南和贵州。

2014 年,全国平均的农村人均纯收入为 9892 元,样本地区为 11155 元。全国平均人均金融机构为 0.16 家,样本地区为 0.17 家。全国人均保费收入为 1485 元,样本地区为 1378 元。样本均值与全国均值相仿。同时,用 T 检验等各种检验方法检验样本与全国之间的差异,检验结果均表明无显著差异。这充分说明调查样本具有较好的代表性^④。另外,金融机构数目在一定程度上综合反映了传统金融的渗透情况,比较东、中、西 3 个农村地区的情况,其中,每万人金融机构网点数方面,东部与西部相近,分别为 1.6149 与 1.6067,中部较低为 1.4727。全国人均村镇银行数方面,东部最低为 0.0056,中

部为 0.0069,西部为 0.0094。最后,保险分支机构数占比方面,55.80%的保险机构都集中在东部,西部拥有 24.40%的保险分支机构,中部最低仅占 19.80%。这说明我国各省份不同金融行业的排斥的确有所不同。

(二)农村金融排斥的特征

调研中发现,当前我国农村金融排斥具有以下特征。

1. 农村金融的供给普遍较低

由于农村市场地处偏远,人口呈散居状态,密集度较低,金融机构在农村市场提供金融服务时的成本较高,因此,金融机构在农村设点普遍偏少,大多仅安排业务人员提供金融服务。在被调查的 119 个村庄提供金融服务的银行中,76%的村庄是农村信用社,71%的村庄是邮储银行,其余依次是国有银行(36%)、农村商业银行(24%)等。保险公司更不在村中设点,最多仅设立兼职或专职的代办员。被调查村庄中,42%的村庄中没有任何保险公司设立代办员,有一家保险公司安排代办员的有 26%,有 1~3 家保险公司安排代办员的有 23%,3 家以上的仅为 9%。被调查村庄总共有 277 名代办员,包括所有的专职和兼职员工,他们要为 465086 常住人口提供服务。平均每位保险代办员的服务对象是 1679 名常住农民,工作量非常庞大^⑤。而且,从各县金融办反映的人均金融机构数目来看,地区差异非常大(图 2)。浙江、山西的情况略好,而广东、河南、广西明显很低。

农村金融机构开展的业务种类也不多,如仅 84%的村庄中金融机构开展办理手机银行服务,但山西、河南、河北、四川的一些农村地区根本不开办此业务。只有 44%的村庄中有金融机构代销保险产品,49%的村庄中有金融机构销售理财产品。绝大多数的农村金融机构都只以办理存款业务为主,一些机构甚至不办理贷款业务。

2. 农户对农村金融的使用率较低

整体上,农户对金融的使用率普遍较低。有 8%的被调查家庭没有任何存折、借记卡、信用卡、贷款或证券账户,也就是说他们几乎从不接触金融机构。调查中,69%的农户家庭有银行存折,56%的家庭有借记卡,21%的家庭有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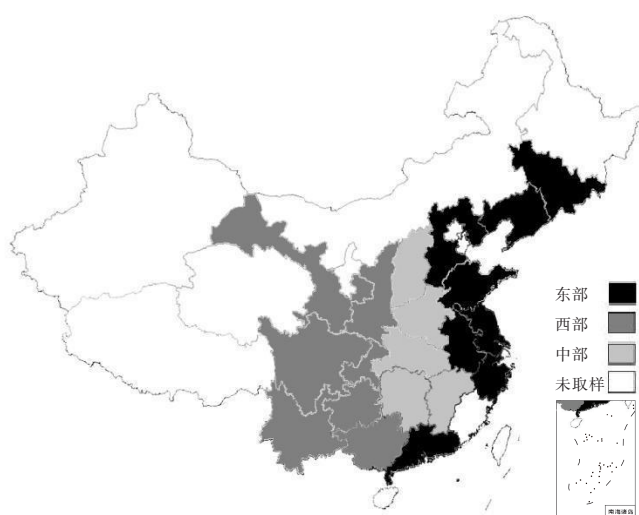


图1 2015年“千村调查”样本分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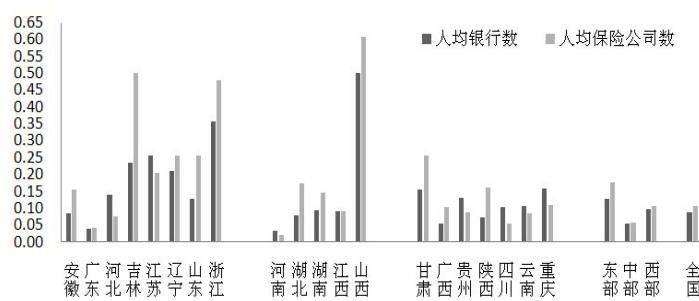


图2 人均金融机构数目(单位:家/万人)

用卡,仅2%的家庭有证券账户,13%的农户家庭曾获得过贷款,41%的农户家庭购买过保险。大多数农民家庭仍过着比较质朴的传统生活,与金融机构的接触也仅是存款业务。大约有76%的农户家庭将闲钱存在银行,但仍有21%的农户家庭把闲钱放在家里。而当他们急需用钱时,绝大多数的农户会选择向亲朋好友求助(76%)。农户家庭对金融业务的使用率非常低,而对互联网金融的使用率相对就更低了(图3)。仅18%的被调查农户家庭会经常使用互联网金融,且各地差异也很大,吉林、甘肃、湖南的农户家庭几乎从不使用互联网金融服务。

3. 农户对金融的理解较低,获取金融知识的途径有限

整体上,农户对金融知识的理解程度是比较低的。25%的被调查农户家庭坦承自己从不关心任何金融知识(图4)。51%的农户家庭坦承自己对保险知识一点都不懂,仅5%的农户家庭认为自己比较懂保险知识。在询问对保险功能的认知时,24%的农户家庭不知道,5%的家庭错误地认为保险就是投资,有71%的农户家庭能准确回答保险的功能是保障。而就互联网金融而言,30%的被调查农户家庭因自己不了解互联网金融而从不使用,这一比例在贵州省高达70%。

一方面,农户的金融知识比较贫乏,另一方面,农户获取金融知识的渠道却比较少。尽管银行和保险公司在推广业务时也宣传金融知识,但相对而言还非常不足。就银行知识的宣传而言,53%的被调查农户家庭主要是从广播电视、报刊书籍及网络中获取有关存贷款等金融知识,而仅15%的农户家庭能从银行获

得相关的知识,还有17%的农户家庭从未获取过任何的银行知识。相对于银行而言,保险公司的宣传工作做得相对较好,26%的农户家庭都是从保险公司那里获得相关的保险知识,仍有19%的农户家庭不知可以从哪里获取保险知识(图5)。各地区相比而言,西部地区的政府在宣传金融知识方面的工作做得更好,24%的西部农户家庭能从政府宣传获取银行知识,26%的西部农户家庭能从政府宣传获取保险知识,而这一数字在东部是9%和17%,在中部更低为8%和12%。因此,获取知识的渠道狭窄进一步加剧了农村金融排斥的程度。

4. 农户对农村金融的整体满意度较低

在供给、需求均不足的农村金融市场,农户与金融机构的接触整体不多。但是,即使有所接触,农户家庭对农村金融的整体满意度也普遍偏低(图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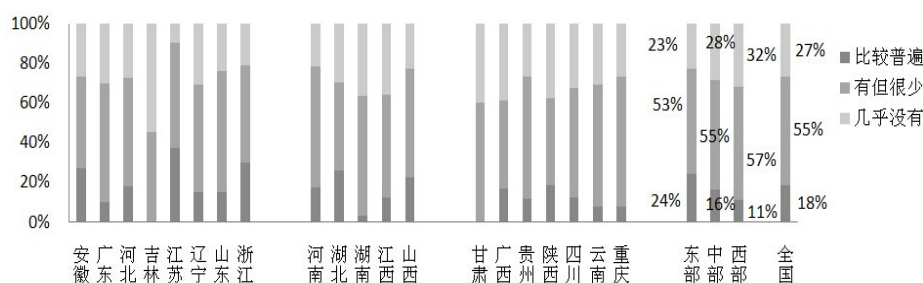


图3 互联网金融的使用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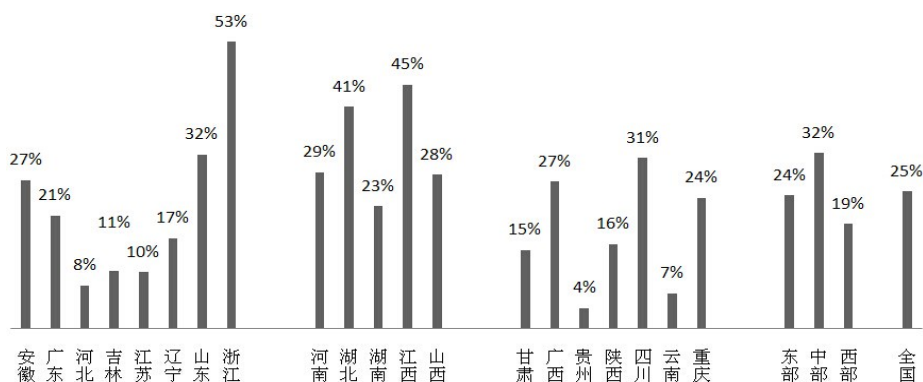


图4 对金融知识不关心的被调查农户家庭比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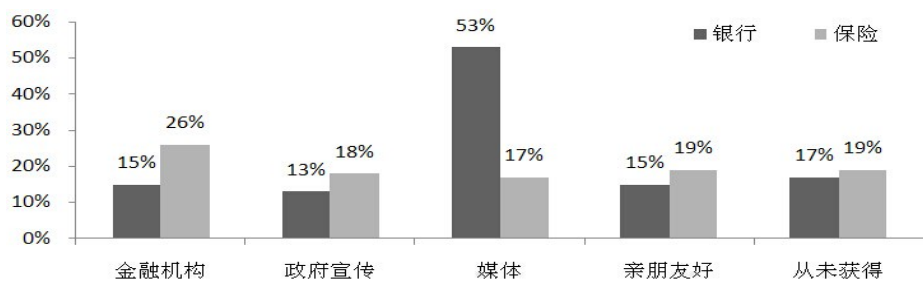


图5 农户家庭获取金融知识的渠道

剔除没有回答该问题的问卷之后,整体满意度最低只有5.03分(云南),最高是9.24分(山西),平均整体满意度只有7.4分(满分10分)。相对而言,中部地区的农户家庭对农村金融满意度相对略高一些,而西部地区的农户家庭满意度最低。农户对保险服务的评价也非常低。有3%的被调查农户家庭认为保险是骗人的,75%的农户家庭觉得很难评价,只有11%的农户家庭认为保险产品很好,11%的农户家庭认为保险产品一般。相对而言,东部地区的农户家庭对保险的评价略微好一些,中部地区的农户家庭对保险评价相对最差。

5. 政府在降低金融排斥方面的作为有限

政府与村干部是农户获取金融知识和保险知识的一个重要渠道。父母官的观点、建议对农户具有非常大的影响力,他们的工作导向具有非常强的指引性。但调查发现,村委会的作为却非常有限。首先,村委会很少为农户组织有关金融的培训。119个村委会中有67%的村委会从未组织任何有关金融的培训。特别是河南、陕西和四川的被调查村委会均未组织任何金融培训,而江苏、江西、广西和贵州较好。整体上,西部村委会组织的金融培训略多一些(77%),而中部最少(50%)。除此之外,在推进有关金融保险的相关工作时,村委会的态度也差别很大。以政策性保险的推进为例,51%的村委会认为自己在积极推进,22%的村委会认为政策性保险仅是作为上级安排的任务完成而已,5%的村委会认为这根本不是自己的任务,还有22%的村委会未予以明确回答。这表明,只有51%的村委会在积极推进政策性保险。从区域上分析,中部的村委会最消极,只有28%的村委会在积极推进,而这一数据在东部和西部分别为

56%和60%。中部有11%的村委会认为这根本不是他们的任务,22%的村委会认为应付一下即可。村干部在金融工作方面作为有限甚至不作为,进一步加大了金融排斥。

三、实证研究设计

那么,我国农村金融排斥的程度究竟如何?各地区存在怎样的差异呢?根据定义,金融排斥表现为某些人群难以获取正规的金融服务,而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则是来自于宏观、微观、机构和个人等多个方面。但是,学者们在分析时大多未严谨区分表象与根源,某些被用于衡量金融排斥表象的指标却被另一些学者用于了根源分析。本文认为,表象是指现实中金融排斥的实际情况,是农户在日常生中对金融服务的使用、感知和效用;而根源是指导致金融排斥的深层次原因,这些原因可能是由于宏观的经济发展因素,也可能是中观的机构投入等行业因素,或微观的农户认知或文化等个人因素。因此需严格区分表象和根源的区别之后,借鉴学者们的做法确定衡量农村市场金融排斥的指标体系。

(一)金融排斥度的衡量

目前,金融排斥的衡量指标选取尚无统一标准。英格兰东南发展机构最先对金融排斥程度进行量化,构造了“复合剥夺指数”,但因数据有限,该方法未能推广。之后的学者们则大多没有区分表象与根源的区别。Beck等(2007)采用了金融服务使用效率和渗透性指标两维度体系。Sarma和Pais(2008,2011)采用了银行渗透度、金融服务可得性和使用情况三维度体系,并用银行账户拥有率、营业网点数和存贷款与GDP之比等分别进行测度。Arora(2010)则从银行服务范围 and 便利性的角度考

察了金融服务可得性在不同国家的差异,并使用了如人均分支机构数等便于比较的相对性指标。Gupte等(2012)则从渗透度、使用度、交易便利程度和交易成本四维度来衡量。Rahman(2013)则采用了渗透便利度、吸纳率、使用效率和满意度四维度体系,并将这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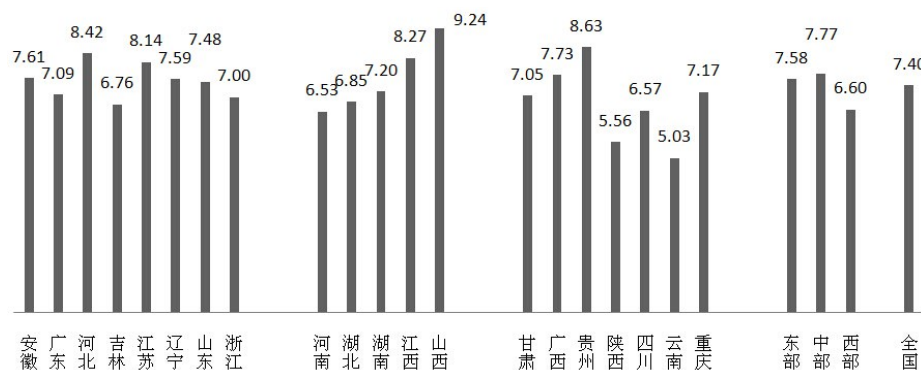


图6 对农村基础金融服务的整体满意度

维度进行加权平均得到最终指数。Ambarkhane 等(2014)采用了供给、需求和基础设施建设三维度体系,进而在 Ambarkhane 等(2016)中考虑了保险、养老金、金融知识和汇款,同时还考虑了一些其他的影响因素,如人口增长率、法制环境及贪污腐败等。这种做法实际上也混淆了表象与根源。我国学者的研究中,李涛等(2010)采用了虚拟变量,认为若居民没有使用储蓄、基金、保险或贷款等金融服务,则认为该个体受到了金融排斥,这实际上是从使用的角度进行的衡量。董晓林和徐虹(2012)用县域金融机构网点分布作为农村金融排斥状况的代理变量。张国俊等(2014)则是借鉴联合国计划开发署编制的人类发展指数(HDI),用渗透度、使用度、效用度和承受度四维度衡量各省份的金融排斥度,也没有严格区分表象与根源。

从研究包含的行业来看,联合国有关金融排斥的定义中虽然是指大金融的排斥状况,但大多学者的研究均仅聚焦于银行业务的排斥状况,并以银行排斥来替代了金融排斥。仅极少数的学者考虑了其他行业。Cebulla(1999)及 Joassart-Marcelli 和 Stephens(2010)将保险业也纳入了金融排斥的范畴,采用主观赋权法为银行和保险赋权。但是,不同行业在大金融中具有不同的比重,也具有不同的排斥程度,而主观赋权的方式过于主观。互联网金融则是近年来发展起来的一个新金融领域,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互联网金融是否能减缓金融排斥,但观点仍不统一。反对者如 Kempson 等(2004)认为,互联网金融使没有电脑和网络的人群使用金融服务时面临不可逾越的困难,会加剧金融排斥。支持者如 Komarova 和 Gonzalez(2015)认为,P2P 等扩大了人们使用金融的渠道,从而能减少金融排斥;曹廷贵等(2015)认为,充分运用互联网技术可减少针对小微企业的金融排斥。基于从大金融角度定义的金融排斥,有关金融排斥的研究应包括银行、保险、证券及新型的互联网金融。但调研发现农户家庭几乎不涉足证券业务,因此本文的研究对象为银

行、保险和互联网金融^⑥。

理论上,衡量金融排斥度的指标应满足:(1)全面反映金融排斥的各个方面;(2)各指标间无交叉重叠;(3)指标能够用数据量化表示。考虑到各行业间的融合与比较,则应该(4)不同行业的指标应尽量一致且可比。参考前人的研究成果,本文对金融排斥的表象与根源进行区分之后,采用渗透度、使用度和效用度三维度指标体系来衡量农村金融排斥。其中,渗透度表现了金融业的宏观覆盖情况,使用度表现了农户对金融服务的微观使用频率,效用度则衡量了金融服务的有效性,包括用户需求满意度及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度。根据三维度的定义和各行业的具体情况,结合我国农村的实际情况,在“千村调查”问卷中设计了调查问题,并根据最能提供有效数据的来源确定了调查对象(见表1)。最后对问卷选项赋值,赋值越小表明金融排斥的现象越严重。

将多指标进行综合先要对各指标赋权。确定权重的方法包括主观赋权法和客观赋权法。客观赋权法能利用样本信息,并排除主观因素影响(胡永宏,2012;栗芳、初立苹,2013),特别以信息熵法的运用最为广泛。参照张卫民等(2003)采用客观

表1 衡量金融排斥度的指标体系

银行	渗透度	金融办:所在县人均存款账户数和贷款账户数;直接用存款和贷款账户数之和
	使用度	农户:家庭成员拥有账户种类数:有一种为1,依次累加 金融办:家庭成员最近一年去银行网点的次数;直接采用实际次数 金融机构:贷款户均额(万元):直接采用贷款户均金额
	效用度	农户:余钱处理方式:放家中为0,民间借贷、发放高利贷或参与投资为1,存银行、买理财产品或基金、股票投资为2。可多选,则把选项数值加总 农户:急需钱时的获取渠道:没有任何办法为0,向亲戚朋友借为1,典当及民间借贷(向钱庄借)、借高利贷为2,从银行或信用社借款、从村镇银行、资金互助社、贷款公司、小贷公司获得贷款为3 农户:对农村基础服务满意度:0~10分
保险	渗透度	金融办:所在县人均保费收入(单位万元);直接采用人均保费收入
	使用度	农户:家庭购买的保险种类数:有一种为1,依次累加 农户:保费支出占家庭年收入的比重:没购买为0,1%以下为1,1%~5%为2,5%~10%为3,10%~20%为4,20%以上为5 村委会:所在村参加政策性保险的农户比例:都没参加为0,50%及以下为1,50%以上为2,都参加了因为是强制性的为3
	效用度	农户:保险公司的赔款占总损失比例:没买为0,30%及以下为1,30%~50%为2,50%~80%为3,80%以上为4 村委会:政策性农业保险的保障力度如何:没有政策性保险为0,保障力度太小,形同虚设为1,有一定的保障力度为2,保障力度较大为3 农户:保险产品的评价:很差为0,不好评价和没买为1,一般为2,很好为3
互联网金融	渗透度	金融机构:该村典型金融机构是否办理移动/手机银行服务:否为0,是为1 村委会:所在村互联网金融使用情况:没有为0,有但很少为1,比较普遍为2
	使用度	农户:使用网络银行服务、第三方支付平台和互联网理财多少年:直接用年数 农户:使用网络银行的功能和第三方支付平台的种类:有一种为1,依次累加 农户:网络支付总金额占家庭年收入比例:直接用比例 农户:互联网理财产品占家庭收入比重:直接用比重
	效用度	农户:使用互联网金融的意愿:不太愿意为1,愿意为2,非常愿意为3 农户:假如急需一笔钱时是否考虑选择互联网金融平台:否为0,是为1

赋值法中的信息熵法进行客观赋权,具体步骤为:假定有 m 个样本,某个维度包含了 n 个指标, $u_i=\{x_{i1}, x_{i2}, \dots, x_{ij}, \dots, x_{in}\}$, ($j=1, 2, \dots, m$)。该维度的数据矩阵 $X=\{x_{ij}\}_{m \times n}$ 。 x_{ij} 代表第 i 个样本的第 j 项指标值。标准化后的矩阵 $Y=\{y_{ij}\}_{m \times n}$ 。则 $e_j=-K \sum_{i=1}^m y_{ij} \ln y_{ij}$ 为第 j 项指标的信息熵值。其中,常数 K 与样本数 m 有关。对于一个信息完全无序的系统,有序度为零时, $e=1$;当仅其中 m 个样本处于完全无序分布状态时, $y_{ij}=1/m$, $K=1/\ln m$, $0 \leq e \leq 1$ 。

某项指标的信息效用价值取决于该指标的信息熵 e_j 与1之间的差值 $d_j=1-e_j$ 。各指标权重由该指标的信息效用价值决定,效用价值越高则越重要。因此,第 j 项指标的权重为 $w_j=d_j/\sum_{j=1}^n d_j$ 。在确定各指标的权重后,用 $f_i=\sum_{j=1}^n w_j x_{ij}$ 代表第 i 个家庭在该维度的得分。 f_i 越小表明排斥度越高。然后再将各维度得分继续综合为该行业的排斥度。在这种多级指标评价系统中,可以根据熵的可加性,利用一级指标(渗透度、使用度、效用度)的信息效用值,按比例直接计算得到排斥程度的权重。先对一级指标的每类指标效用值求和,得到各维度的效用值和,记作 D_k ($k=1, 2, 3$), k 分别表示3个维度。进而计算得到全部指标效用值的总和 $D=\sum_{k=1}^3 D_k$ 。则每个维度的权重为 $W_k=D_k/D$,各一级指标的权重为 $W_j=d_j/D$ 。排斥度为 $F_i=\sum_{k=1}^3 \sum_{j=1}^n W_j x_{ij}$ 。根据银行、保险和互联网金融分别在渗透度、使用度和效用度的表现,则可以分别计算得到各金融行业排斥度。

(二)金融排斥的根源分析

有关金融排斥的产生根源,一些学者认为金融排斥并非全是机构之错,部分人群存在自我排斥或无真实需求,并进而表现出不使用金融服务的现象。Allen等(2013)认为,金融排斥的存在源于两种原因,或因为某些因素不愿获得金融服务的自我排斥,或虽愿意获得金融服务但因距离、成本及信息不对称等因素而无法获得的被动排斥。田力等(2004)提出,中国农村地区金融排斥主要由供需不平衡导致。Sarma(2008)提出了六维度指标,包括物理排斥、评估排斥、条件排斥、价格排斥、营销排斥和自我排斥。其中,物理排斥是指由于地理位置偏远而导致;评估排斥是指由于金融体系风险管理过程评估过程而导致;条件排斥则指由于一些特定的金融限制条件而导致的;价格排斥则指因金融产

品价格较高而导致的;营销排斥则指由于金融产品销售和市场定位而导致的;自我排斥则指由于消费者自己害怕被拒绝或由于心理障碍而导致其将自己排斥在金融服务之外。六维度指标实际上主要是从供给角度分析了金融排斥的成因,并考虑了自我排斥的可能性。Cebulla(1999)从造成金融排斥的主体出发,将其分成由金融系统或机构导致的结构排斥和个人造成的主体排斥。实际上也是考虑了供给排斥和需求排斥两个方面。董晓林和徐虹(2012)从金融供给的角度研究影响我国农村金融排斥的因素。

其次,学者们还研究了导致金融排斥的其他原因。学者们大多一致认为,金融排斥与收入水平存在明显的负相关关系(张杰,2005;王志军,2007;王修华等,2013)。除此之外,Jianakoplos和Bernasek(1998)、Devlin(2005)及Puri和Robinson(2007)认为社会人口学特征、家庭经济状况和心理因素也是金融排斥的深度成因。Gimet和Lagoarde-Segot(2012)认为,相比于单纯扩张银行规模而言,促进竞争和资本市场发展能更有效地降低金融排斥。田霖(2007)认为,我国金融排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金融知识贫乏、证券市场参与度较低等。李涛等(2010)认为,家庭资产和社会互动程度的提高均能显著降低城市居民的金融排斥,而居民在银行储蓄方面是否被排斥也影响着其在基金、保险等其他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刘海二(2013)认为,手机银行等新型模式拓展了金融交易边界,有利于降低金融排斥的现象。张国俊等(2014)则认为,地方财政支出占当期GDP比重、人口密度、城镇化水平和收入水平会对金融排斥产生影响。

综合学者们的观点,本文认为分析导致金融排斥的根源时应首要考虑供给和需求,其中需求方面又可分为自我排斥和无需求。供给方面的原因则包括:(1)物理排斥。金融服务设施的不便利和不可获得从而影响了消费的机会成本。(2)评估排斥。金融评估程序阻碍了消费者对金融产品的获取。(3)价格排斥。金融产品价格较高,部分群体必须支付自己不能承受的价格才能获取金融服务。(4)营销排斥。部分群体被排除在营销范围或营销目标之外。自我排斥则包括。(5)对金融知识了解不够、金融意识淡薄。(6)对金融行业的信任不够。

无需求则体现于(7)根本没有任何需求。根据这7个方面的指标含义和各行业的具体情况设计调查问题(见表2),并确定最为合适的调查对象和赋值。赋值越小,则表示情况越严重。

当然,除了供给与需求的主要原因之外,其他一些因素也会对金融排斥产生影响。借鉴学者们的做法,本文选择一些宏观因素和微观因素作为控制变量(见表3)。所有这些控制变量也都出自于“千村调查”的调查数据。考虑到银行、保险和互联网金融的可比较性,因此主要考虑了对不同行业排斥均具有影响的共性因素。

大多数学者采用回归分析法来分析影响金融排斥的各种因素(张国俊等,2014),田霖(2007)则采用主成分分析、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本文的研究目的不仅要分析这些因素是否具有影响,更重要的是要找出金融排斥的主要根源,探索各因素的影响大小。因此本文采用 Oaxaca-Blinder 分解法。

表2 金融排斥根源的指标体系

银行	供给排斥	物理排斥	农户:去银行办业务所需时间=1/(路上时间步行大约+窗口排队等候时间)
		评估排斥	金融机构:所在县个人申请贷款被拒绝的比例;直接采用比例
		价格排斥	金融机构:所在村典型金融机构利率比一般基准利率上浮比例;直接采用比例
	营销排斥	农户:获取金融知识的渠道种类:从未获得相关知识为0,亲朋好友为1,广播电视、报纸书籍、网络为2,政府宣传为3,金融机构工作人员为4,多选则加总	
		农户:是否关心金融知识:不关心为0,其他为1	
自我排斥	了解不够	村委会:所在村是否组织过金融教育培训:否为0,是为1	
	信任不够	农户:是否认为目前的金融服务不太安全:是为0,否为1	
	无需求	农户:家庭收支的结余情况:入不敷出为0,无结余和说不清楚为1,有结余为2 农户:是否曾经有贷款需求:从未有过为0,其余为1	
保险	供给排斥	物理排斥	村委会:所在村代办员人数:直接采用人数
		评估排斥	农户:您未投保的原因是因为觉得理赔麻烦吗:是为0,否为1
		价格排斥	农户:您未投保的原因是因为感觉保险产品不划算吗:是0,否为1
	营销排斥	农户:获取保险知识的途径:不知道为0,听邻居、朋友、亲戚为1,自己通过媒体为2,政府宣传与村干部讲解为3,保险公司宣传为4。多选则加总	
		农户:看到周围发生灾难时是否想到买保险:否为0,是为1	
自我排斥	了解不够	农户:对保险产品首要功能的理解:不知道和没用处为0,投资为1,保障为2	
	信任不够	农户:您未投保的原因是因为对保险产品不信任吗:是为0,否为1	
	无需求	农户:人身保险需求:家庭人员结构=(老人人数+孩子人数)/家庭人口总数 农户:财产保险需求:家庭资产种类(住房、汽车、摩托车、电动车、船),有一种为1,依次累加	
互联网金融	供给排斥	物理排斥	农户:是否有网络接入:否为0,是为1
		评估排斥	价格排斥、营销排斥均不存在*
		营销排斥	农户:您不使用互联网金融的原因是因为自己不了解吗:是为0,否为1
	自我排斥	了解不够	农户:您不使用互联网金融的原因是因为觉得它不安全吗:是为0,否为1
		信任不够	农户:是否有使用互联网金融服务的需求:根本没必要为0,其他为1
无需求	农户:是否有使用互联网金融服务的需求:根本没必要为0,其他为1		

注:*互联网金融排斥的根源分析中,考虑到互联网金融具有跨越时空、坐等宣传、对象均等业务特征,因此不存在评估排斥、价格排斥和营销排斥,仅存在物理排斥。

表3 影响金融排斥的控制变量

变量名称	定义	文献出处
经济状况	村委会:过去一年村民人均纯收入(单位元)	田霖,2007
医疗卫生	村委会:村卫生室和私人诊所总数	李卫平等,2003
交通便利	村委会:所在村与最近火车站的距离	Church等,2000; Petersen和Rajan, 2002;王丽等,2012
信用环境	金融机构:金融机构对农户的信用评价:信用情况比较糟糕、恶意逃债行为时有发生为0,信用一般、偶尔赖账或违约为1,很守信用、基本不赖账为2	Jaffee和Russell, 1976
福利水平	村委会:五保户供养标准/村民人均纯收入	王静等,2014
教育程度	村委会:所在村高中及以上学历人数比例	Guiso等(2008);李涛等(2010)
外出务工	村委会:所在村外出务工人员比例	霍焰(2013)

Oaxaca-Blinder 分解法广泛应用于分解收入差距(邢春冰,2008),后来也被应用于其他领域(李明等,2010)。参考 Jann(2008)的二部法分解地域之间的差异,将地域差异表示为:

$$R=[E(F_e)-E(F_w)]\beta^*+[E(F_e)(\beta_e-\beta^*)+E(X_w)(\beta^*-\beta_w)] \quad (1)$$

其中,等式右边的第一部分是由模型中所考虑的供给、需求和控制变量能解释的部分,第二部分是模型不能解释的部分。其含义是指除模型中已考虑因素之外的其他因素所产生的影响。该部分在不同领域有不同含义,并随模型所考虑的因素而具有不同解释。根据本文对该模型使用的含义以及模型中所考虑的各种因素,不能解释部分则表示供给、需求及各控制变量之外的其他因素造成的差异,比如政府、文化、习惯及各金融行业的特殊影响因素等等。当然,可解释部分还可以进一步分解成供给、需求及各控制变量的贡献

度,即:

$$(\hat{F}_e - \hat{F}_w)\hat{\beta}_e = (\bar{F}_{1e} - \bar{F}_{1w})\hat{\beta}_{1e} + (\bar{F}_{2e} - \bar{F}_{2w})\hat{\beta}_{2e} + \dots \quad (2)$$

四、实证分析

(一)金融排斥度的衡量与差异分析

根据信息熵法分别计算得到每个样本农户家庭在不同金融行业的排斥度,各省份的描述性统计如表4。数值越小表明排斥度越高,0则表示完全排斥。按排斥度从高到底进行排名。由描述性统计结果可粗略判断,各金融行业在不同省份的排斥度差异非常大。

表4中,银行排斥度最高的前五省份为江苏、云南、江西、广东和河南;保险排斥度前五的省份为:江西、湖北、广东、云南和陕西;互联网金融排斥度前五的省份则为吉林、四川、重庆、贵州和陕西。从各区域来看,东部农村地区的各行业排斥度普遍偏低。但江苏的银行排斥度特别高,这可能与江苏的民间

中国农村金融排斥的区域差异:供给不足还是需求不足?

中国农村发展论坛

金融比较发达有关系。广东的传统金融排斥度普遍偏高,而互联网金融排斥比较低,这可能与广东的民间金融比较发达、外来务工人员较多有关系。吉林的互联网金融排斥特别高则可能与硬件

设施有关。中部农村地区的传统金融排斥呈两级分化,互联网金融排斥普遍不高。这说明中部农村地区的消费者具有一定的金融需求,在无法寻求传统金融服务时,只能更多地使用互联网金融业务。西部农村地区的传统金融排斥差异较大,甘肃、贵州等贫困农村地区的银行排斥却比较低,这可能是由于当地政策性金融的扶持原因造成的;而西部互联网金融的排斥普遍严重则与西部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投入较为薄弱是相一致的。

进而用 Oaxaca-Blinder 分解法计算东、中、西三区域在银行排斥度、保险排斥度和互联网金融排斥度的不同差异(见表5)。

表5中,从区域整体的排斥度分析,三行业排斥度的区域差异并不一致。银行排斥度从高到低排序为中部、东部、西部,各地区之间的差异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保险排斥度从高到低则为中部、西部、东部,中部的保险排斥很严重,差异值也都在1%的水平上显著。互联网金融的排斥度则从高到低为西部、中部和东部,西部地区的互联网金融排斥与其他两个地区存在显著差异,但东部和中部无显著差异。

(二)各行业排斥的根源分析

为了探索造成各农村地区在银行、保险和互联网金融排斥方面存在显著差异的原因,采用 Oaxaca-Blinder 分解法,按行业对3个农村地区进行两两比较。

1. 银行排斥度的根源分析

根据(1)式和(2)式对银行排斥度进行 Oaxaca-Blinder 分解,分解结果见表6。

表6中显示,平均而言,银行排斥由供给需求原因造成的模型解释部分占比较高,而且均非常显著。整体上,银行市场还是能有效运转的,供给与需求因素能充分解释银行排斥的原因。这可能是因为银行业相对而言的发展历史最为悠久,银行业务最为成熟。农户相对而言对银行业务的了解略微多一些,对银行的信任度更高一些。所以,农村银行市场基本上能自行正常运转,也能用传统的供求理论来进行解释。除此之外,

表4 各省份三金融行业排斥度描述性统计

	省份	数量	银行排斥度			保险排斥度			互联网金融排斥度		
			排名	均值	标准差	排名	均值	标准差	排名	均值	标准差
东部	浙江	399	17	0.2329	0.0292	19	0.2817	0.1661	20	0.2621	0.1632
	河北	400	10	0.1641	0.0703	14	0.1786	0.1220	19	0.2303	0.1569
	广东	374	4	0.1443	0.0287	3	0.1248	0.0908	15	0.1827	0.1630
	江苏	201	1	0.1304	0.0239	15	0.1794	0.1206	14	0.1787	0.1052
	安徽	329	11	0.1682	0.0258	20	0.2989	0.1880	13	0.1738	0.1391
	辽宁	198	16	0.1947	0.0219	16	0.1816	0.1166	8	0.1561	0.1044
	山东	385	8	0.1601	0.0295	9	0.1601	0.0914	7	0.1529	0.1123
	吉林	197	18	0.2362	0.0245	11	0.1651	0.0856	1	0.1380	0.0909
东部				0.1775			0.1994			0.1913	
中部	山西	195	19	0.2603	0.0190	18	0.2500	0.1395	18	0.2229	0.1520
	河南	502	5	0.1449	0.0308	12	0.1688	0.1228	17	0.1940	0.1601
	江西	342	3	0.1394	0.0234	1	0.1016	0.0764	16	0.1844	0.1353
	湖南	355	12	0.1624	0.0254	8	0.1528	0.0908	12	0.1628	0.1351
	湖北	199	13	0.1824	0.0201	2	0.1235	0.0714	9	0.1568	0.0977
中部				0.1664			0.1551			0.1839	
西部	甘肃	200	15	0.1931	0.0235	10	0.1602	0.0954	11	0.1588	0.0900
	广西	200	6	0.1460	0.0216	6	0.1498	0.0893	10	0.1571	0.1046
	云南	200	2	0.1377	0.0241	4	0.1329	0.0980	6	0.1509	0.1005
	陕西	154	14	0.1571	0.0248	5	0.1376	0.1336	5	0.1495	0.1072
	贵州	209	20	0.3062	0.0223	17	0.2348	0.1057	4	0.1485	0.0870
	重庆	200	9	0.1734	0.0217	7	0.1518	0.0989	3	0.1455	0.0942
	四川	399	7	0.1900	0.0272	13	0.1723	0.0998	2	0.1392	0.0821
西部				0.1883			0.1651			0.1486	
全国		5638		0.1774	0.0517		0.1774	0.1272		0.1774	0.1330

表5 Oaxaca-Blinder 差异分析

	Oaxaca-Blinder 预测值			Oaxaca-Blinder 差异值		
	东部	中部	西部	东部 vs 中部	东部 vs 西部	中部 vs 西部
银行	0.1775***	0.1664***	0.1883***	0.0111*** (7.22)	0.0107*** (6.13)	0.0218*** (12.01)
保险	0.1994***	0.1551***	0.1651***	0.0433*** (10.99)	0.0342*** (8.68)	0.0101*** (2.58)
互联网金融	0.1913***	0.1839***	0.1486***	0.0075 (1.62)	0.0428*** (11.44)	0.0353*** (8.22)

注: * $p < 0.1$, ** $p < 0.05$, *** $p < 0.01$, 括号内的为T值。本文采用人均自来水产量(立方米/万人)作为人均收入的工具变量,运用弱工具变量识别检验和 Hausman 检验,证明本文提出的模型均无内生性。限于篇幅,不再详细汇报。

表6 银行排斥的 Oaxaca-Blinder 分解结果

		东部(2) vs 中部(1)			东部(2) vs 西部(3)			中部(1) vs 西部(3)		
		系数	t值	%	系数	t值	%	系数	t值	%
供给排斥	物理排斥	0.0000	-0.50	-0.35	0.0000	-0.06	-0.10	-0.0004***	-2.73	-1.75
	评估排斥	-0.0034***	-6.85	-30.97	-0.0002	-0.46	-1.52	-0.0018***	-4.82	-8.28
	价格排斥	-0.0010***	-2.25	-8.98	0.0050***	10.22	46.18	0.0023***	5.90	10.75
	营销排斥	0.0006***	3.72	5.67	0.0011***	4.47	9.90	0.0069***	10.18	31.51
自我排斥	了解不够	0.0034***	8.36	30.46	0.0003	1.00	2.96	0.0028***	6.81	12.63
	信任不够	0.0001	1.29	0.68	0.0000	-0.88	-0.27	0.0001	0.97	0.28
无需求	经济状况	0.0032***	8.89	28.43	-0.0008	-1.15	-7.02	0.0055***	7.59	25.24
	医疗卫生	-0.0019***	-4.49	-16.71	0.0060***	6.97	56.02	0.0010***	4.98	4.62
交通便利	信用环境	0.0005*	1.67	4.26	0.0001	0.86	1.14	0.0009***	2.44	4.31
	福利水平	-0.0019***	-6.84	-17.04	0.0028***	7.58	26.49	0.0016***	2.96	7.25
教育程度	信用环境	0.0013***	2.68	11.43	0.0239***	22.01	222.59	-0.0008***	-2.26	-3.86
	福利水平	0.0007***	2.67	5.90	0.0002	1.04	1.87	0.0001	0.23	0.31
外出务工	教育程度	-0.0004***	-2.06	-4.02	-0.0001	-1.28	-1.14	0.0003**	2.02	1.58
	模型解释部分	0.0044***	9.57	39.60	-0.0052***	-10.26	-48.39	-0.0017***	-3.45	-7.92
其他因素部分	模型解释部分	0.0054***	4.35	48.37	0.0331***	19.00	308.71	0.0167***	11.19	76.66
	其他因素部分	0.0057***	3.85	51.63	-0.0224***	-11.77	-208.71	0.0051***	3.21	23.34
常数项		0.2120***	18.24		-0.0092	-0.74		0.2029***	18.45	
样本数		4076			4045			3155		

注:百分比为该原因的系数除以排斥度总差异。由于资源限制,我们的调研并未涵盖中国的每一个行政区域。比如,西部地区未包括西藏、新疆、青海等地,未全面反映西部金融排斥的状况。本文针对东部、中部和西部的分析仅代表对被调查各省份的分析。另外,表中负百分比表示劣势地区的该方面表现比优势地区更好,从而缩小了金融排斥的地区差距。

银行业还受到其他一些模型未考虑因素的显著影响。比如农户的消费习惯(Modigliani, 1986)和投资偏好(Ross et al., 2004)的影响,同时,政府干预也会影响银行信贷配置效率从而导致金融排斥(王珏等, 2014)。

其次,从模型分解的根源来看,银行排斥的地区差异是由供给排斥、自我排斥和无需求共同导致的结果。其中,供给排斥是造成西部优于东部和中部的的主要原因,分别占东西部和中西部差异的54.46%和32.23%;这与调研中发现的西部政策性金融发展较好的现象是一致的。而中部落后于东、西部的主要原因是自我排斥,该原因分别占东中部和中西部差异的31.14%和12.91%;这也与图4中发现的中部农村地区农户不关心金融知识的现象一致。无需求也是三大根源之一,银行业务的需求与农户的收入息息相关,有闲钱才有存款。这也说明还是存在因农户收入较低而不存在银行业务需求的现象。相比而言,特别是中部的农户无需求的现象最甚。深入分析供给排斥中的深层次根源,平均而言,价格排斥是供给排斥的第一大原因,东、中部地区都存在较为严重的价格排斥,而西部地区的价格排斥相对较轻微。西部的农户能以相对便宜的价格获得银行服务。这也与西部政策性金融的优惠政策(如贷款补贴等)的现象一致。营销排斥是供给排斥的第二大原因,特别是中西部的营销排斥差距最大(31.51%)。评估排斥是供给排斥的第三大原因,东部的评估排斥最大。这说明东部的农户在获取银行服务时,在评估方面有较高的门槛。物理排斥不是导致银行排斥的显著原因。

从控制变量中的分析中可以看到,整体上,影响地区差异的控制变量差别非常大。特别是:(1)信用环境的改善也能显著降低银行排斥度(Jaffee & Russell, 1976):东西部差异中222.59%是由信用环境造成的,西部村民信用环境较好,因此银行业排斥度较低。(2)提高外出务工人员比例能显著降低银行排斥度(霍焰, 2013):东部外出务工人员最多,中部和西部如能加强人员流动,也能有效降低银行排斥度,特别是西部地区的潜力最大。(3)经济状况对银行排斥度的影响比较奇特,

似乎经济越不发达的地区银行排斥度越低,这可能是由于经济欠发达地区有更多政策性金融的扶持。(4)交通便利也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银行排斥。各地福利水平、医疗卫生和教育程度的差异均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银行排斥度的差异。

2. 保险排斥度的根源分析

根据(1)式和(2)式对保险排斥度进行 Oaxaca-Blinder 分解,分解结果见表7。

表7保险排斥的地区差异分解结果中,能用模型解释的部分非常小,且不显著或仅在10%的置信度下显著;而其他因素部分占很大比重,且均在1%的置信度下显著。这说明,在我国农村保险市场上,用传统的供求理论、经济影响、教育、环境、人口等诸多因素都无法解释农村保险市场排斥度较高的原因,或者说,农村保险市场基本处于失灵的状态。的确,除受到模型已考虑因素的影响之外,保险产品还具有与银行产品完全不同的特殊特征。农业保险具有典型的正外部性特征(Ward & Zurbrugg, 2000)而使得农村保险市场基本完全失灵,因此必须通过政府补贴才可以正常运作(Wright & Hewitt, 1994),但政府对农村保险市场的不正当补贴和干预也会导致保险市场扭曲并失灵。此外,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也是导致农村保险市场失灵的一个重要原因(冯文丽, 2004)。

供给和需求的总体影响均不显著,其中仅个别因素的影响较显著。相对而言,保险排斥的地区差异首先源于无需求,特别是西部地区的农户家

表7 保险排斥的 Oaxaca-Blinder 分解结果

		东部(3)vs 中部(1)			东部(3)vs 西部(2)			中部(1)vs 西部(2)		
		系数	t值	%	系数	t值	%	系数	t值	%
供给不足	物理排斥	-0.0003	-1.12	-0.70	-0.0002	-0.87	-0.70	-0.0001	-0.34	-0.57
	评估排斥	0.0001	0.65	0.32	-0.0005**	-2.17	-1.53	0.0005**	2.36	4.70
	价格排斥	-0.0005	-0.95	-1.04	-0.0007	-1.36	-2.10	0.0002	0.37	1.83
自我排斥	营销排斥	0.0007	1.45	1.52	-0.0014***	-3.11	-4.06	0.0016***	3.48	16.26
	了解不够	0.0034***	3.33	7.56	-0.0063***	-5.81	-18.36	0.0083***	7.73	82.24
	信任不够	0.0006	1.20	1.34	-0.0021***	-4.36	-6.21	0.0023***	4.83	23.07
无需求	无需求	0.0046***	5.70	10.49	0.0127***	9.01	37.00	-0.0073***	-6.72	-72.77
	经济状况	-0.0011	-1.26	-2.44	-0.0057***	-3.12	-16.76	-0.0010**	-2.36	-9.87
	医疗卫生	0.0005	1.61	1.18	-0.0004	-0.87	-1.25	0.0013**	2.34	12.80
交通便利	交通便利	-0.0096***	-8.57	-21.61	0.0056***	5.50	16.45	-0.0023***	-1.96	-22.31
	信用环境	0.0048***	3.35	10.85	-0.0118***	-5.27	-34.48	-0.0023***	-3.04	-22.54
	福利水平	-0.0001	-0.16	-0.23	-0.0004	-1.04	-1.25	0.0001	0.11	0.87
教育程度	教育程度	-0.0005*	-1.86	-1.23	-0.0001	-0.18	-0.16	-0.0004	-1.02	-4.03
	外出务工	0.0010	1.32	2.35	0.0042***	4.42	12.38	-0.0020***	-3.27	-20.32
	模型解释部分	0.0037	1.23	8.36	-0.0072*	-1.79	-21.02	-0.0011	-0.43	-10.65
其他因素部分	其他因素部分	0.0406***	9.57	91.64	0.0414***	8.21	121.02	0.0112***	2.96	110.65
	常数项	0.0782**	2.32		-0.0129	-0.35		0.0911***	2.80	
	样本数	4076			4045			3155		

庭无需求现象最为严重,中部次之,东部相对最好。这也印证了保险需求是与经济发展程度密切相关的。西部的保险需求较低,相对而言政策性保险发展还较好,导致农户的商业保险需求更少。其次是源于对保险的了解不够而导致的自我排斥。相对而言,西部农户对保险的了解程度相对最好,而中部农户的了解程度最差,若中部农户能提高对保险的了解程度,则能有效降低保险排斥,并显著缩小与其他地区的差距(与图4一致)。这也说明了西部政策性保险的有效性,与调研中显示的政府工作态度表现一致。供给排斥的影响大多不显著,相对而言,营销排斥略为突出,保险公司在西部地区的营销投入相对最大。

在控制变量的分析结果中,控制变量对保险排斥的影响在3组对比中各不相同。特别是:(1)信用环境也能有效降低保险排斥度(Jaffee & Russell, 1976):保险人和被保险人之间的信息往往不对称,因此保险公司十分看重信用环境。信用环境原因占中西部差异的22.54%,即西部信用环境较好,这大大缩小了中西部保险排斥的正向差距。同理,西部信用环境优于东部,这也缩小了东西部的正向差距。(2)交通便利也能有效降低保险排斥度,西部地区的交通较不方便,提高了保险排斥度。(3)外出务工人员比例能有效降低保险排斥度,这与银行排斥的分析完全一致(霍焰,2013)。若西部农村地区能提高人员流动性,也能有效降低保险排斥。(4)经济状况较低的地区保险排斥度却比较低,特别是西部农村地区,这也与银行排斥一样,西部的政策性保险发展较好,有效降低了保险排斥度。医疗卫生和教育程度也均在一定程度上有轻微影响。

3. 互联网金融排斥度的根源分析

根据(1)式和(2)式对互联网金融排斥进行Oaxaca-Blinder分解,分解结果见表8。

表8中显示,由于互联网金融的内涵毕竟与传统银行业务一致,只不过营销和处理业务的渠道是借助互联网而已。所以,互联网金融排斥的其他因素部分普遍低于保险市场。但由于互联网金融毕竟是新兴业务,发展还不太成熟,还受一些特殊因素的影响,所以其他因素部分普遍高于银行

市场。比如,互联网金融除了受到风险文化(陈岸清,2009)和消费习惯(谢平、邹传伟,2012)的影响之外,还受到各地政策扶持的影响。整体上互联网金融的市场比较有效,供给需求能揭示的部分基本都显著。因此,传统的供求理论等在互联网金融领域还是比较有效。

从供给与需求的角度分析,互联网金融排斥的首要原因是供给排斥中的物理排斥。物理排斥差异为三区域互联网金融排斥分别贡献了98.98%、55.02%和41.04%。其中,西部农村地区的物理排斥最严重。的确,互联网金融需要基本的硬件设施,否则根本无法开展互联网金融。东部农村地区经济较为发达,硬件设施相对较好,因此互联网金融排斥较低。其次,因对互联网金融的了解不够而导致的自我排斥也比较明显。相对而言,中部地区的农户对互联网金融的了解程度最好,甚至高于了东部地区;而西部地区农户对互联网的了解最差。无需求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互联网金融排斥,中部地区农户的互联网金融需求相对最高。这也在一定程度显示由于中部农村地区的传统银行排斥较高,农户的金融需求无法得到满足而转向互联网金融。

在控制变量的分析中,由于互联网金融交易模式和交易途径的特殊性,所以传统控制变量在这里大多不显著。相对而言,(1)外出务工比例增加会降低互联网金融排斥度(霍焰,2013)。外出务工人员比例较高的地区具有较强的流动性,一方面他们越能够接受新鲜事物,另一方面也正是由

表8 互联网金融排斥的Oaxaca-Blinder分解结果

		东部(3)vs 中部(2)			东部(3)vs 西部(1)			中部(3)vs 西部(1)		
		系数	t值	%	系数	t值	%	系数	t值	%
供给不足	物理排斥	0.0074***	4.29	98.98	0.0235***	13.21	55.02	0.0145***	8.63	41.04
	了解不够	-0.0021***	-2.64	-27.74	0.0035***	5.38	8.23	0.0057***	6.77	16.26
	信任不够	-0.0003	-0.65	-4.33	-0.0011**	-2.50	-2.68	-0.0008*	-1.69	-2.13
自我排斥	无需求	-0.0016**	-2.18	-21.70	0.0011	1.54	2.64	0.0027**	3.31	7.57
	经济状况	0.0018**	2.17	24.02	0.0058***	3.40	13.54	0.0001	0.12	0.17
	医疗卫生	0.0000	-0.10	-0.17	0.0000	0.07	0.01	0.0002	0.97	0.69
	交通便利	-0.0015**	-2.41	-20.30	-0.0018**	-2.05	-4.16	-0.0030**	-2.47	-8.45
	信用环境	-0.0018	-1.29	-24.42	-0.0005	-0.26	-1.24	-0.0022**	-2.56	-6.23
	福利水平	-0.0025***	-3.29	-33.50	0.0001	0.93	0.32	0.0016**	1.97	4.66
	教育程度	-0.0004*	-1.68	-5.27	-0.0001	-0.35	-0.20	-0.0002	-0.43	-0.48
	外出务工	0.0021**	2.57	28.18	0.0029***	3.57	6.88	0.0013***	2.95	3.61
	模型解释部分	0.0010	0.33	13.75	0.0335***	9.13	78.35	0.0200***	7.48	56.71
	其他因素部分	0.0064	1.39	86.25	0.0093**	2.07	21.65	0.0153***	3.90	43.29
	常数项	0.0911***	2.80		-0.0868***	-3.47		0.0003	0.01	
	样本数	4076			4045			3155		

注:东中部能解释部分和不能解释部分均不显著,与表5中一致。东部和中部互联网金融排斥整体上不存在显著差异;且能解释部分中正向和负向原因相抵消。

于人员的流动性带来了资金流动性需求的增加,互联网金融正好满足了这一需求。(2)经济状况较好能降低互联网金融排斥度(田霖,2007)。这是造成互联网金融排斥度东部低于中部和西部的重要原因,分别占24.02%和13.54%。这也充分说明了经济发展较好的农村地区有较好的硬件设施,农户收入较高,除却政策性金融的影响,无论是传统金融还是互联网金融,经济发展较好的农村地区相对而言金融需求还是较高。(3)交通不发达有利于降低互联网排斥度。的确,由于传统金融与互联网金融的互补性,在交通较为发达的地区,农户可以寻求传统金融的服务;而在交通不发达的农村地区,农户因寻求传统金融服务的难度更高而转向使用互联网金融。这与表6和表7中有关交通便利对传统金融的分析结果相一致。

五、研究结论及对策建议

根据前文的分析结果,将银行、保险和互联网金融排斥度的各根源汇总比较于表9。

表9中显示,农村地区银行排斥的主要根源是供给排斥,尤其以价格排斥最为突出,营销排斥及评估排斥也是主要原因之一。其次则是源于无需求和因了解不够的自我排斥。农村地区保险排斥的根源则完全不同,供给与需求理论基本不发挥作用,农村保险市场基本是失灵的。从供给与需求的角度分析,则源于无需求和因了解不够而导致的自我排斥。保险公司的营销排斥也有一定的显著影响。农村地区互联网金融排斥的主要根源则是供给排斥中的物理排斥,因不了解而导致的自我排斥和无需求也有显著影响。在控制变量的分析中,银行和保险作为传统金融的代表,比较完善和成熟,诸多影响因素都显著地影响着银行排斥;而互联网金融作为新兴金融,特别在农村地区

还处在萌芽之中,传统的各种影响因素大多不完全显著。整体上,外出务工显著地对3个行业的排斥度都产生着影响。这说明人口流动带来的资金流动及文化交流对金融需求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提高信用环境和改善交通状况也是降低农村传统金融排斥的有利条件。除此之外,改善经济状况也有利于降低农村金融排斥。

目前,我国农村金融排斥仍然是比较普遍的现象,各农村地区存在不同程度的银行排斥、保险排斥和互联网金融排斥,差异也较大。不同行业排斥的根源也不完全相同。政府和金融机构应根据这些分析结果,有的放矢地采取行动,以有效降低该农村地区的金融排斥,从而让金融业更好地为农业和农村发展服务。对于银行业而言,各银行机构应成为降低银行排斥的主力军,大力降低价格排斥和营销排斥,加大对农户的宣传和培训,提高农户对银行的理解程度和信任程度。从政府的角度而言,在对西部加大政策性金融扶持政策的同时,应注意兼顾中部,不能因不公平的政策而导致中部农村地区的银行排斥加剧。对于保险业而言,在农村保险市场严重失灵、供给和需求理论不发挥作用的情况下,政府就必须有所担当。学者们认为农村保险市场没有政府的支持就必定失败(Wright & Hewitt, 1994)。所以,政府应当在农村地区加大保险的培训和宣传,采取合适的政策性保险的扶持力度^⑦,扩大基本保障的宽度和深度,逐渐培育起一个健康有序的保险市场。保险公司则可以通过加大宣传,改善农户对保险的认知,加大营销力度,在一定程度上也能有效降低保险排斥。对于互联网金融业而言,加大农村地区基础设施的投入,改善劣势地区的物理条件,做到村村有网络、家家能用电脑,则互联网金融排斥会大幅度下降。同时,加大对农户进行互联网金融的培训、提高认知,也有利于降低互联网金融排斥。总之,普惠金融是一个美好的愿望,农村金融排斥是普遍存在的现实。不同金融行业由于不同的根源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排斥现象。我们必须在普惠金融的大框架下,有针对性地克服不同行业的排斥现象,才可能最终实现真正意义上更广泛范围内的普惠金融。

(作者单位:上海财经大学;责任编辑:程漱兰)

表9 农村地区各金融行业排斥的主要根源的汇总排序

	银行排斥	保险排斥	互联网金融排斥
其他		其他因素	
供给与需求	供给排斥:价格排斥 营销排斥 评估排斥	无需求	供给排斥:物理排斥
	无需求	自我排斥:了解不够	自我排斥:了解不够
	自我排斥:了解不够	供给排斥:营销排斥	无需求
	信用环境	信用环境	外出务工
控制变量	外出务工	外出务工	经济状况
	经济状况	交通便利	交通便利
	交通便利	经济状况	

注释

①1930年,美国联邦住宅银行委员会提出“住房安全图”政策,使某些“特定地理位置”的居民很难获得住房贷款。这一制度被称为空间上的红线制度,后来又逐渐演变为种族上的红线制度。其实质是因歧视某部分人群而拒贷。这一现象引起了学者的广泛讨论,直至1977年美国《社区再投资法》颁布后才有所缓解。

②本调查中采用了广义的互联网金融的定义,包含以互联网为交易平台的传统金融服务;及第三方支付平台等新兴的互联网金融业务。

③考虑到银行、保险和互联网金融的行业特征不同,衡量各行业排斥的指标体系不完全相同。因此,严格地讲,同一个省份的银行排斥、保险排斥和互联网金融排斥之间不具有可比性。

④相关数据来自万德数据库、《中国保险年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金融年鉴》。为了进一步证实抽样的合理性,还制作了各指标的样本分布与全国分布对比图,并进行了T检验、符号检验、秩和检验和Kolmogorov-Smirnov检验。这些检验均表明,本文的样本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因篇幅限制,未详细汇报。

⑤2014年底中国内地约136782万人,保险代理人约600万人,每位保险代理人平均需服务228人。这是包括农村和城市在内的全国平均水平。而“1679名”仅针对被调查的农村地区。实际上,保险代理人的确大多都集中于城市,密度远远大于了农村地区,从而导致数据的差距很大。如果把被调查农村地区的人均服务对象数目与城市的人均服务对象数目相比较,估计差距会更大。

⑥调研发现,农户在基金、股票和债券方面的使用情况普遍非常低。调查样本中,仅4.71%的农户家庭拥有证券账户;拥有基金、股票和债券的农户家庭分别占1.96%、4.71%、0.44%。2.76%的农户会考虑购买理财产品或基金,没有农户曾经做过期货。农村地区也没有任何证券公司的营业网点。因此本文按照国际上最初的做法(焦瑾璞,2014),有关金融排斥的研究中不考虑基金、股票、债券等证券业,只研究参与度相对较高的银行、保险和互联网金融业。

⑦正如表7中西部保险排斥的表现一样,政策性保险的推广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能提高农户的保险知识,降低保险排斥度。但另一方面又由于政策性保险得来容易,在一定程度上会削弱农户的保险自发性和积极性,又造成无需求的局面。因此,有关政策性保险的具体支持措施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 (1) Allen, F., Demirgüç-Kunt, A. and Klapper, L., 2016, “The Foundations of Financial Inclusion: Understanding Ownership and Use of Formal Accounts”, *Journal of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 Vol. 27, pp. 1~30.
- (2) Ambarkhane, D., Singh, A. S. and Venkataramani, B., 2014a, “Developing a Comprehensive Financial Inclusion Index”, Available at SSRN 2485774.
- (3) Ambarkhane, D., Singh, A. S. and Venkataramani, B., 2016, “Measuring Financial Inclusion of Indian Stat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ural Management*, Vol.12(1), pp. 72~100.
- (4) Arora, R. U., 2010, *Measuring Financial Access*, Griffith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Accounting, Finance and Economics.
- (5) Beck T, Demirgüç-Kunt A. and Peria M. S. M., 2007, “Reaching out: Access to and Use of Banking Services across

Countries”,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Vol. 85 (1), pp. 234~266.

(6) Beck, T. and Honohan, P., 2008, *Finance for all?: Policies and Pitfalls in Expanding Access*, World Bank Publications.

(7) Cebulla, A., 1999, “A Geography of Insurance Exclusion: Perceptions of Unemployment Risk and Actuarial Risk Assessment”, *Area*, Vol. 31(2), pp. 111~121.

(8) Church, A., Frost, M. and Sullivan, K., 2000, “Transport and Social Exclusion in London”, *Transport Policy*, Vol. 7 (3), pp. 195~205.

(9) Conroy, J., 2005, “APEC and Financial Exclusion: Missed Opportunities for Collective Action?”, *Asia Pacific Development Journal*, Vol. 12(1), pp. 53~80.

(10) Devlin, J. F., 2005, “A Detailed Study of Financial Exclusion in the UK”, *Journal of Consumer Policy*, Vol. 28(1), pp. 75~108.

(11) Gimet, C. and Lagoarde-Segot, T., 2012, “Financial Sector Development and Access to Finance. Does Size Say It All?”, *Emerging Markets Review*, Vol. 13(3), pp. 316~337.

(12) Guiso, L., Sapienza, P. and Zingales, L., 2008, “Trusting the Stock Market”, *The Journal of Finance*, Vol. 63(6), pp. 2557~2600.

(13) Gupte, R., Venkataramani, B. and Gupta, D., 2012, “Computation of Financial Inclusion Index for India”, *Procedia-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Vol. 37, pp. 133~149.

(14) Jaffee, D. M. and Russell, T., 1976, “Imperfect Information, Uncertainty and Credit Rationing”,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90(4), pp. 651~666.

(15) Jann, B., 2008, “The Blinder-Oaxaca Decomposition for Linear Regression Models”, *The Stata Journal*, Vol. 8(4), pp. 453~479.

(16) Jianakoplos, N. A. and Bernasek, A., 1998, “Are Women More Risk Averse?”, *Economic Inquiry*, Vol. 36(4), pp. 6~20.

(17) Joassart-Marcelli, P. and Stephens, P., 2010, “Immigrant Banking and Financial Exclusion in Greater Boston”,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Vol. 10(6), pp. 883~912.

(18) Kempson, E., Atkinson, A. and Pilley, O., 2004, “Policy Level Response to Financial Exclusion in Developed Economies: Lessons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Report of Personal Finance Research Centre*, University of Bristol.

(19) Komarova, Y. and Gonzalez, L., 2015, “Competition Against Common Sense: Insights on Peer-to-peer Lending as a Tool to Allay Financial Exclus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ank Marketing*, Vol. 33(5), pp. 605~623.

(20) Leyshon, A. and Thrift, N., 1993, “The Restructuring of the UK Financial Services Industry in the 1990s: A Reversal of Fortune?”,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Vol. 9(3), pp. 223~241.

(21) Leyshon, A. and Thrift, N., 1994, “Access to Financial Services and Financial Infrastructure Withdrawal: Problems and Policies”, *Area*, Vol. 26(3), pp. 268~275.

(22) Leyshon, A. and Thrift, N., 1995, “Geographies of Financial Exclusion: Financial Abandonment in Britain and the United States”,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Vol.20(3), pp. 312~341.

(23) Leyshon, A. French, S. and Signoretta, P., 2008, “Financial Exclusion and the Geography of Bank and Building Soci-

ety Branch Closure in Britain”,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Vol. 33(4), pp. 447~465.

(24) Modigliani, F., 1986, “Life Cycle, Individual Thrift, and the Wealth of Nations”,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76(3), pp. 297~313.

(25) Morrison, P. S. and O’Brien, R., 2001, “Bank Branch Closures in New Zealand: The Application of a Spatial Interaction Model”, *Applied Geography*, Vol. 21(4), pp. 301~330.

(26) Oaxaca, R., 1973, “Male-female Wage Differentials in Urban Labor Markets”,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Vol. 14(3), pp. 693~709.

(27) Petersen, M. A. and Rajan, R. G., 2002, “Does Distance still Matter? The Information Revolution in Small Business Lending”, *The Journal of Finance*, Vol. 57(6), pp. 2533~2570.

(28) Puri, M. and Robinson, D. T., 2007, “Optimism and Economic Choice”,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Vol. 86(1), pp. 71~99.

(29) Rahman, M. H., 2013, “Employees’ Motivation in Public and Private Commercial Banks in Bangladesh: A Study on Need-Based Approach”, *Global Disclosure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Vol. 2(2), pp. 98~91.

(30) Ross, S. A., 2004, “Compensation, Incentives and the Duality of Risk Aversion and Riskiness”, *The Journal of Finance*, Vol. 59(1), pp. 207~225.

(31) Sarma, M. and Pais, J., 2008, “Financial Inclusion and Development: A Cross Country Analysis”,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Human Development and Capability Association, New Delhi.

(32) Sarma, M. and Pais, J., 2011, “Financial Inclusion and Development”,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Vol. 23(5), pp. 613~628.

(33) Sarma, M., 2008, *Index of Financial Inclusion*, Indian Council for Research on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Relations.

(34) Ward, D. and Zurbrugg, R., 2000, “Does Insurance Promote Economic Growth? Evidence from OECD Countries”, *Journal of Risk and Insurance*, Vol. 67(4), pp. 489~506.

(35) Wright, B. D. and Hewitt, J. A., 1994, “All-risk Crop Insurance: Lessons from Theory and Experience”, *Economics of Agricultural Crop Insurance: Theory and Evidence*, Springer Netherlands, pp. 73~112.

(36) 曹廷贵、苏静、任渝:《基于互联网技术的软信息成本与小微企业金融排斥度关系研究》,《经济学家》,2015年第7期。

(37) 陈岸清:《个人网上银行顾客忠诚影响因素研究》,厦门大学博士论文,2009年。

(38) 董晓林、徐虹:《我国农村金融排斥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基于县域金融机构网点分布的视角》,《金融研究》,2012年第9期。

(39) 冯文丽:《我国农业保险市场失灵与制度供给》,《金

融研究》,2004年第4期。

(40) 胡永宏:《对统计综合评价中几个问题的认识与探讨》,《统计研究》,2012年第1期。

(41) 霍焰:《农民收入增长与农村金融发展的互动研究》,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年。

(42) 焦瑾璞:《中国小额信贷的任务和发展愿景》,《中国金融》,2010年第9期。

(43) 李明、潘春阳、苏晓馨:《市场演进,职业分层与居民政治态度——一项基于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实证研究》,《管理世界》,2010年第2期。

(44) 李涛、王志芳、王海港:《中国城市居民的金融排斥状况研究——基于微观调查数据的经验证据》,《经济研究》,2010年第7期。

(45) 李卫平、石光、赵琨:《我国农村卫生保健的历史、现状与问题》,《管理世界》,2003年第4期。

(46) 刘海二:《全球手机银行的现状、模式、监管与金融包容》,《上海金融》,2013年第9期。

(47) 栗芳、初立苹:《中国金融业综合融资能力的动态比较及特征分析》,《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3年第11期。

(48) 田力、胡改导、王东方:《中国农村金融融量问题研究》,《金融研究》,2004年第3期。

(49) 田霖:《我国金融排除空间差异的影响要素分析》,《财经研究》,2007年第4期。

(50) 王静、吴海霞、霍学喜:《信贷约束、农户融资困境及金融排斥影响因素分析》,《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

(51) 王珏、骆力前、郭琦:《地方政府干预是否损害信贷配置效率?》,《金融研究》,2015年第4期。

(52) 王丽、曹有挥、刘可文:《高铁站区产业空间分布及集聚特征》,《地理科学》,2012年第3期。

(53) 王修华、傅勇、贺小金:《中国农户受金融排斥状况研究——基于我国8省29县1547户农户的调研数据》,《金融研究》,2013年第7期。

(54) 王志军:《金融排斥:英国的经验》,《世界经济研究》,2007年第2期。

(55) 谢平、邹传伟:《互联网金融模式研究》,《金融研究》,2012年第11期。

(56) 邢春冰:《农民工与城镇职工的收入差距》,《管理世界》,2008年第5期。

(57) 许圣道、田霖:《我国农村地区金融排斥研究》,《金融研究》,2008年第7期。

(58) 张国俊、周春山、许学强:《中国金融排斥的省际差异及影响因素》,《地理研究》,2014年第12期。

(59) 张杰:《农户、国家与中国农贷制度:一个长期视角》,《金融研究》,2005年第2期。

(60) 张卫民、安景文、韩朝:《熵值法在城市可持续发展评价问题中的应用》,《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3年第6期。